

联盟成本分担与利益攸关认知： 美国亚太同盟凝聚力的演化^{*}

彭 博

内容提要：自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以来，美国坚持要求日本与韩国分担更多的联盟成本。然而，同是在日韩增加联盟成本分担的情况下，美日与美韩同盟的凝聚力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受了较大削弱，但在拜登政府时期得到明显恢复甚至进一步的强化。根据传统联盟理论，主导国维持或增加对联盟的投入，有助于维护和提升联盟凝聚力，反之亦然。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反差，提出了一个研究问题：当主导国分担联盟成本的意愿和能力下降、而从属国增加成本分担时，联盟凝聚力为何出现不降反升的情况？文章在引入利益攸关认知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日韩加大联盟投入的前提下，特朗普未能给予美日与美韩同盟以充分的战略承诺，且没有给予日韩在同盟中基本的角色价值认可，严重降低了两国的利益攸关认知，进而削弱了同盟凝聚力；相反，拜登政府不仅充分给予美日与美韩同盟以战略承诺，并且对日韩在同盟中的角色价值给予高度认可，极大提升了两国的利益攸关认知，从而增强了同盟凝聚力。文章通过深入剖析联盟从属国的利益攸关认知，在理论层面丰富了联盟凝聚力的解释路径，在现实层面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演化动力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解读。

关键词：联盟成本分担 利益攸关认知 联盟凝聚力 美国亚太同盟

作者简介：彭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23YZD02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当代亚太》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一、问题的提出

拜登就任总统以来，虽然一改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口号，且不像其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迫使盟友增加军费开支，但并没有放弃令盟友分担更多联盟成本的要求。2021年3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在布鲁塞尔发表题为“重申和重振美国的联盟”的讲话中指出，“尽管不能仅凭数字反映一个国家对保卫我们集体安全与共同利益的贡献，特别是在一个无法用军事力量应对越来越多威胁的世界里。但我们必须承认，由于盟友具有不同的能力和相对优势，他们将以不同的方式承担自己的责任”。^①

尽管如此，同是在日韩增加联盟成本分担的情况下，美日与美韩同盟的凝聚力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受了较大削弱，却在拜登政府时期得到了明显的恢复甚至进一步的强化。美日、美韩同盟的这种动态变化，与传统联盟理论中“主导国加大/减少投入导致联盟凝聚力强化/削弱”的既定判断形成了鲜明的理论与现实反差。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研究问题：当联盟主导国分担成本的意愿和能力有所下降，而从属国增加成本分担时，联盟凝聚力为何出现不降反升的情况？具体到美日与美韩同盟的语境中，本文进一步提出该理论问题所蕴含的实证问题，即在日本与韩国均增加成本分担的前提下，为何美日和美韩同盟的凝聚力在特朗普时期有所削弱，而在拜登时期却得到了强化？

二、既有研究

自冷战以来，联盟成本分担一直是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矛盾焦点。回顾既有文献，关于联盟成本分担及其对联盟凝聚力影响的研究可谓不胜枚举。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基本上来自博弈论、制度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等几个重要视角。

（一）博弈论视角

博弈论认为，联盟的建立是每个成员国对各自预期收益进行一系列讨价

^① Antony J. Blinken, “Reaffirming and Reimagining America’s Alliance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4, 2021, <https://www.state.gov/reaffirming-and-reimagining-americas-alliances/>.

还价的结果。^① 联盟内每个成员国都是独立的博弈者，都具有独立的成本分担需求。换言之，联盟内的国家都是理性行为体，会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有关联盟成本分担的决策。^② 无论是主导国还是从属国，联盟成员国都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来决定是否增加或减少对联盟成本的分担。

格伦·斯奈德 (Glenn H. Snyder) 对“联盟安全困境” (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 的解读，是一个经典的、从博弈论视角出发建构的联盟理论。根据联盟安全困境理论，联盟成员国在“被牵连” (entrapment) 与“被抛弃” (abandonment) 之间进行着复杂的平衡与博弈，这些国家围绕联盟特定条款进行持续的讨价还价。^③ 美国盟友对美国核政策进行影响的程度，较好地呈现了联盟安全困境理论的意义。例如，挪威凭借其关键的地理位置而非物质性力量，获得了北约对其“被牵连”恐惧的理解，使前者不必为后者提供常驻基地。在冷战时期，美国高度依赖挪威从克拉半岛 (Kola peninsula) 监控苏联核武装弹道导弹潜艇 (SSBN) 部署的能力。^④

主导国向参与具体行动的盟友支付交易性成本，以换取从属国对联盟战略的遵从与配合，也体现了博弈论视角下联盟成员国在成本分担问题上的一种互动模式。在联盟支轴国家 (pivotal state) / 主导国的报酬或补助激励下，联盟从属国会派遣士兵参与海外军事行动。支轴国家通过奖励盟友对多边行动的支持，提高了联盟的凝聚力与多边行动的合法性。这种奖励包括“部署补贴” (deployment subsidies) 与“政治交易” (political side deals)，前者是对参与行动所需花费成本的补贴；后者则是与行动成本无关的交易，包括贸易协定、债务减免和制裁减免等。相应地，有三类从属国可能接受这种交易：一是资源不足的国家；二是有能力在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家；三是将联盟部署视为谈判条件的机会主义国家。^⑤

①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② 任琳、郑海琦：《虚弱的联盟扩容与全球治理秩序》，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1期，第1~37页。

③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p. 461-495.

④ Barry R. Posen, “Inadvertent Nuclear War? Escalation and NATO’s Northern Flank”, in Steven E. Miller and Stephen V. Evera eds., *Naval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32-358.

⑤ Marina E. Henke, “Buying Allies: Payment Practices in Multilateral Military Coalition-Build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 2019, pp. 128-162.

主导国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等手段对（潜在）盟友进行“国际贿赂”（international bribery），也是博弈论在联盟成本分担上的一种体现。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 Walt）指出，援助方（donor）提供经济或军事援助能够创造有效的盟友，因为受援方（recipient）或展示其对援助方的有利意图和感激之情，或在经济和安全上更加依赖于援助方。简言之，援助方提供的援助越多，会导致联盟愈加紧密。^① 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向第三世界运送武器表示关切，时任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的弗雷德·伊克莱（Fred C. Ikle）警告称，苏联向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军事援助将使中美洲变成“另一个东欧”。基于该逻辑，彼时负责安全援助和科学技术的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巴克利（James Buckley）提出，美国应增加向这些地区的武器援助，以帮助“复兴美国联盟”。^②

（二）制度理论视角

联盟（特别是多边联盟）在正式建立之后，通常呈现为一种制度形态。联盟内的制度规则安排以及一系列相应的行为规范，为联盟成员国解决分歧、调节成员国关系、管理联盟内部事务等提供了机制性的依据。^③ 从该视角来看，联盟作为一种安全制度，既可以在联盟既有的成本分担结构下稳定成员国彼此的合作预期，也可以为成员国调整联盟成本分担结构提供一个机制性的沟通平台。

斯蒂芬·福鲁凌（Stephan Frühling）与安德鲁·奥尼尔（Andrew O’Neil）认为，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联盟涉及美国核武器政策、规划或使用方面的制度合作。通过批判传统“延伸核威慑”范式的不足，他们指出，美国联盟中的核武器合作提供了一种制度手段，可以在盟友间存在差异性战略优先事项时，建立和维持联盟凝聚力。^④ 以北约为例，对于联盟内物质实力相

^①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1985, pp. 3-43.

^② James Buckley’s Speech is Reprinted in Current Policy No. 279, “Arms Transfers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 21, 1981,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p. 2.

^③ 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90~106页。

^④ Stephan Frühling and Andrew O’Neil, “Nuclear Weap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and Asia: Toward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8, Iss. 1, 2016, pp. 4-25.

对较弱的从属国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形式的联盟能够为其提供“核保护伞”。在可预见的安全威胁与对被牵连/被抛弃的恐惧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联盟制度可以为从属国提供一个平台，使其能够与美国就安全保障的细节与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联盟成本等问题进行机制性的讨价还价。对联盟主导国美国而言，当其充分履行联盟内的核承诺义务时，联盟制度可以为其带来作为西方联盟领导者的声誉，反之亦然。^①

盟友间通过安全资源的社会交换，建立并强化彼此间的安全关系，实际上同样赋予了联盟以制度属性。泉川康弘（Yasuhiro Izumikawa）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一个“成本—收益”框架，为理解东亚地区未出现多边安全联盟的现象提供了替代性解释。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无法自给自足，需要通过建立联盟实现彼此安全资源的交换，从而获得安全收益。^②一旦从属国从主导国获得充分的安全承诺，从属国之间加强彼此安全关系的动力就会减弱，这是东亚地区没有出现多边安全联盟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联盟呈现双边的制度属性。相反，如果从属国未能从主导国获得安全承诺，他们彼此进行安全资源交换、加强安全关系的动力将提升，因而愿意构建集体安全机制以抱团取暖，则联盟会呈现向多边安全制度演化的趋势。当从属国彼此间加强安全关系能够为主导国带来正安全外部性时，将得到主导国支持，从而有助于强化联盟凝聚力。相反，当从属国彼此间加强安全关系给主导国带来负安全外部性时，主导国将反对，联盟凝聚力也将随之削弱。

基于成本分担考量的联盟转型，可被理解为一种制度的变迁。当从属国在联盟转型问题上进行抉择时，往往因其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会特别在意其中的收益与成本关系，因为一旦决策失误，从属国具有的回转空间极为有限。对于从属国而言，既有联盟向新联盟的转型，通常意味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收益，但同时也将需要其付出新的成本。如果从属国认为转型后的新联盟给自身带来的收益大于自己担负的成本，从属国将支持联盟转型，导致现联盟凝聚力的削弱。相反，如果从属国认为新联盟带来的收益小于成本，则从

^① Stephan Frühling and Andrew O'Neil, "Nuclear Weap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and Asia: Toward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p. 21

^② Yasuhiro Izumikawa, "Network Connec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Hub-and-Spokes Alliance System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5, No. 2, 2020, pp. 7-50.

属国将与主导国基于共同利益联合抵制联盟转型，使既有联盟的凝聚力得到维持甚至强化。^①从制度论视角来看，前一种情况意味着联盟成员国成本分担结构发生变化，联盟的制度形态也随之变迁；后一种情况则意味着联盟的既有制度形态得以维持甚至强化。

（三）集体行动理论视角

联盟是否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员国能否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从成本分担视角来看，公共产品理论是理解联盟成员国集体行动的经典理论。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和理查德·泽克豪斯（Richard Zeckhauser）将联盟视为一种对每个成员国都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安全公共产品。^②当联盟作为纯粹的公共产品时，其对集体行动将产生几方面影响：（1）联盟成本以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ality）的方式分担，防务开支以次优（suboptimality）方式进行分配；（2）合作可以解决次优问题，合作形式既可以从属国与主导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关系，也可以是盟友间加强互动的频率；（3）纯粹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属性，导致缺乏投资于威慑的消费竞争，意味着没有充分理由限制联盟规模，新进入者可在不分担成本的情况下受益；（4）由于越来越多的盟友选择“搭便车”，导致联盟的威慑效果与成本分担之间的匹配度愈发减弱，不利于联盟稳定。^③

综合考量上述几点影响，可得出如下逻辑：当联盟主导国拥有超强实力和广泛政策目标时，有意愿和能力对地区与全球安全公共产品进行长期投资。主导国通过付出不对称的联盟成本，换取来自从属国的战略收益，同时也为从属国提供了“搭便车”以获得安全收益的机会，有助于维系和强化联盟凝聚力。然而，当主导国实力下降或政策目标发生变化时，不再具有意愿或能力继续承担不成比例的成本，联盟出现次优化趋势，导致集体行动难题。^④出于对非均

^① 黄宇兴：《谈判能力与联盟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77～101页。

^② Mancur O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8, No. 3, 1966, pp. 266-279.

^③ Todd Sandler and Keith Hartley, "Economics of Alliances: The Less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9, No. 3, 2001, pp. 869-896.

^④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36. 奥尔森认为，可以通过提供“选择性激励”解决“集体行动难题”。“选择性激励”可以是成本供给者提供的排他性奖励，也可以是来自他国的承诺、威胁或劝说。参见张宇燕、任琳：《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载《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3期，第1～29页。

衡性与非纯粹性的考量，主导国和从属国均不愿为联盟公共产品贡献其最优防务开支。^① 这导致两种情形：一是联盟出现分化并最终走向瓦解；二是从属国迫于无奈，只能增加资源投入填补主导国“抽身”后的空缺，导致联盟形态发生转变。^②

综上，既有研究从博弈论、制度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等多个视角，就联盟成本分担对联盟凝聚力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均得出主导国分担联盟成本与联盟凝聚力之间呈现较强正相关性这一结论，即主导国分担越多的联盟成本，联盟凝聚力越强，反之亦然。然而，通过观察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时期美日与美韩同盟的凝聚力变化趋势，既有研究中的这种正相关性似乎面临着一定挑战。对此，本文尝试引入利益攸关认知概念，以此构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以求完善和丰富联盟成本分担与联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解释路径。

三、理论框架

本文的核心意义是构建一个解释联盟凝聚力的理论机制，并结合过程追踪法与案例分析对该机制进行检验。德里克·比奇（Derek Beach）和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Rasmus Brun Pedersen）提出了过程追踪法的三种变体，即理论检验型过程追踪、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与解释结果型过程追踪。^③ 本文采用理论检验型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首先，界定基本前提“联盟成本分担”、自变量“利益攸关认知”与因变量“联盟凝聚力”等分析要素的内涵与外延，使其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其次，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构建一个因果机制，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最后，通过逐步推进的实证分析，检验该因果机制的各分析要素是否符合研究假设。其中，前两个步骤是理论建构部分的主要任务，最后一步将在实证考察部分展开论述。

① James Murdoch and Todd Sandler,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NATO",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6, No. 2, 1982, pp. 237-263.

② 左希迎：《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第4~28页。

③ 德里克·比奇、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过程追踪法：基本原理与指导方针》，汪卫华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1页。

（一）基本前提：联盟成本分担

本文将联盟成本分担界定为，联盟成员国在联盟建立、运转、管理与转型等主要过程中，对联盟集体安全能力建设进行的成本分担。戴维·莱克(David Lake)将成本结构视为一种合同关系，他指出，国家是理性行为者，不存在对特定关系类型的偏好，而是根据不同环境对关系进行选择与塑造。当国家在决定进入或塑造某一种关系时，重点考虑的是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期望的安全水准。^①以此类推，联盟形态的塑造与演化，是成员国在战略或安全收益与集体成本分担之间进行博弈的过程与结果。

在单极的国际力量格局下，联盟多呈现为“主导国—从属国”的非对称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主导国为获取从属国让渡的自主权及其相应的战略收益，需要分担比从属国更多的集体安全成本；从属国物质实力较弱，无法凭借自身力量维护安全，且不能有效分担联盟集体安全成本，需要通过让渡自主权以换取主导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及相应的安全收益。^②尽管主导国与从属国从联盟中获取的收益不尽相同，但这种非对称结构有助于稳定彼此的预期收益，因而使得联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与较强的凝聚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单极霸权体系下的联盟在成本分担方面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当从属国“搭便车”现象愈发严重时，主导国由从属国获取战略收益的边际效益就会递减，导致其继续承担较大比例联盟成本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下降，进而要求从属国承担更多成本分担。从属国会根据自身利益决定是否增加对联盟成本的负担，并不可避免地会与主导国在该问题上进行新一轮的讨价还价和博弈。

讨价还价和博弈通常会导致两种情境。一是主导国和从属国没能就成本分担问题达成新共识，均不愿维持或增加对联盟的成本投入，导致联盟凝聚力降低，甚至引发联盟的破裂和解体。在这种情境中，联盟成本分担与联盟凝聚力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因果关系，这在既有研究中已经被反复印证了。二是主导国与从属国就新的成本分担结构达成基本共识，从属国出于某种原因同意增加对联盟成本的负担。与第一种情境不同，在第二种情境下，即使

^① David A. Lake, "Anarchy, Hierarchy, and th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1, 1996, pp. 1-33.

^② Matthew DiGiuseppe and Patrick E. Shea, "Alliances, Signals of Support, and Military Effor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7, No. 4, 2021, pp. 1067-1089.

从属国愿意分担更多的联盟成本，也无法直观地判断出其是否一定有助于联盟凝聚力的强化或削弱，这就需要引入其他要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将第二种情境作为基本假定前提，即联盟主导国在缺乏意愿和能力继续维持或增加对联盟成本分担的情况下，从属国无论出于自愿还是迫于主导国压力，实际上分担了更多的联盟成本。在这个基本假定前提下，本文引入一个自变量“利益攸关认知”，以此丰富对联盟凝聚力强弱变化的解释。

（二）自变量：利益攸关认知

通过将“利益攸关认知”作为自变量，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主导国不增加/减少投入，从属国增加投入”的基本前提下，探讨其对因变量“联盟凝聚力”的具体影响。本文将利益攸关认知界定为“联盟成员国对联盟存在价值以及自身在联盟中角色价值的认知”。在该定义的基础上，出于方便操作化的考虑，本文将利益攸关认知分解为两个具体指标，一是联盟成员国对联盟存在价值的认知，二是联盟成员国对自身在联盟中角色价值的认知。

指标一：联盟成员国对联盟存在价值的认知，是指联盟成员国对联盟的存在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确保其战略收益与安全收益的认知。这种认知主要源于联盟主导国对联盟的战略承诺，即对联盟存在价值的认可程度，以及从属国对这种战略承诺的反应。在操作层面，该指标主要表现为，当主导国增强对联盟的战略承诺，也就是对联盟战略收益持肯定态度时，从属国会相应提升对联盟确保自身安全利益的预期，进而有助于增强从属国对联盟的利益攸关认知。相反，当主导国减少对联盟的战略承诺，也就是对联盟战略收益持否定态度时，从属国会相应降低对联盟确保自身安全利益的预期，进而会削弱从属国对联盟的利益攸关认知。

指标二：联盟成员国对自身在联盟中角色价值的认知，是指联盟成员国对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在联盟存续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和扮演关键角色的认知。这种认知主要源于主导国对从属国在联盟中发挥作用的认可程度，以及从属国对这种认可程度的反应。在操作层面，该指标主要表现为，当主导国对从属国持有较高的角色价值认可，并主动提升从属国的联盟地位时，这种行为将被从属国理解为主导国对其所做贡献的回报和奖励，这将有助于提升从属国对联盟的利益攸关认知。相反，当主导国对从属国持有较低的角色价值认可，并主动降低从属国的联盟地位时，这种行为将被从属

国理解为主导国对其作用的忽视甚至打压，这将削弱从属国对联盟的利益攸关认知。

（三）因变量：联盟凝聚力

既有研究对联盟凝聚力的塑造、加强和削弱等已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对本文具有很大启发。受相关研究启发，本文通过两个指标——从属国与主导国的战略协调^①和从属国寻求自主性的努力^②——来衡量联盟凝聚力。总体而言，当从属国越积极寻求自主性，在战略行为上寻求与联盟外主要国家的沟通与对接，则联盟凝聚力越低；相反，当从属国越无意寻求自主性，在战略行为上与主导国保持协调一致，则联盟凝聚力越高。总体上，联盟凝聚力与从属国寻求自主性的努力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在具体操作层面，本文从政治、安全和经济三个领域衡量从属国与主导国的战略协调。首先，在政治上，从属国与主导国就战略目标或具体政策等达成协议，发表联盟官方文件或联合声明，强化联盟承诺和联盟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其次，在安全上，从属国与主导国开展联合军事演习，以提升协同作战能力、提高互信，并强化对安全挑战的共同认知；从属国为主导国提供威慑延伸的前沿基地，强化对联盟主要对象国的战略威慑等。最后，在经济上，从属国切实履行其在集体防务分担上约定的义务与责任，包括从属国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从属国增加联盟共同防御支出的比例等。

同样地，本文从外交、安全和经济三个领域对从属国寻求自主性的努力进行观察与判断。首先，从属国寻求外交自主性的主要表现是，从属国与联盟外主要国家积极开展外交接触，就某些事关联盟内外国家的热点问题展开多方位、多渠道的沟通，致力于实现在外交场域的左右逢源。其次，从属国寻求安全自主性的主要表现是，从属国加大对自身防卫能力建设的投入，并积极发展同联盟外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等。最后，从属国寻求经济自主性的主要表现是，从属国强调与联盟外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重要性，积极阐释自己与联盟外国家发展战略的聚合点，并主动提议和规划与这些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

^① 李泽：《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与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128～155页。

^② 韦宗友：《“美国优先”对美韩、美日同盟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6期，第84～98页。

(四)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在对上述基本前提与变量进行操作化界定的基础上，本文建构了一个理论框架（见图 1），从利益攸关认知的视角阐释联盟成本分担对联盟凝聚力发挥影响的作用机制，该理论机制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基本假设。

假设一：在联盟主导国不增加或减少联盟成本分担，而从属国增加投入的前提下，如果主导国削弱对联盟的战略承诺且否定从属国在联盟中的角色价值，将降低从属国的利益攸关认知，进而削弱联盟凝聚力。

假设二：在联盟主导国不增加或减少联盟成本分担，而从属国增加投入的前提下，如果主导国加强对联盟的战略承诺且肯定从属国在联盟中的角色价值，将提升从属国的利益攸关认知，进而强化联盟凝聚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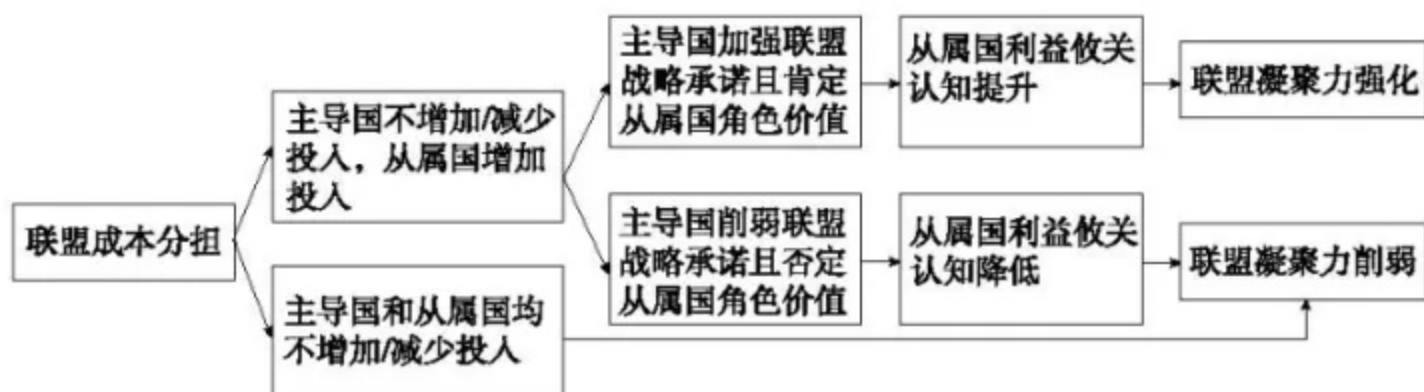


图 1 联盟成本分担对联盟凝聚力的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四、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凝聚力的实证考察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经历了调整与重塑的过程，特别表现为美日、美韩同盟在联盟成本分担、联盟成员国利益攸关认知及其所导致的联盟凝聚力变化等几个维度，这一定程度上源于联盟主导国美国的政策变化，以及日韩等联盟从属国对美国联盟政策不断适应过程中的战略调整。

本文选择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作为实证分析对象的主要原因是：（1）两个同盟在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时期的演化过程，均能够对照本文理论框架的各个分析要素，从而有助于实现“理论—现实”的对话联动。具体到操作层面，本文对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实证分析，将严格按照基本前提“联盟

成本分担”、自变量“利益攸关认知”与因变量“联盟凝聚力”三个分析要素逐步推进。(2) 相较于单一案例研究，通过对比分析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演化，可以更好地展现不同变化程度的利益攸关认知对联盟凝聚力的影响，从而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进行更为细致地观察，有助于更好实现对比分析与分析视角的平衡。具体到操作层面，本文在运用相同分析视角对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异同之处，体现在每个案例分析的小结部分。

(一) 美日同盟

1.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日同盟

(1) 日本增加联盟成本分担。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在联盟成本分摊问题上对日本频频施压。与历届美国总统从战略思维看待日本不同，特朗普将其商人风格淋漓尽致地运用在美日关系中，较大改变了对日政策目标，将日本视为可以交易的对象。^① 尽管日本对美国在联盟成本分摊问题上咄咄逼人的做法存在诸多不满，但为应对特朗普的批评以及维持美日同盟关系的稳定，日本也在尽力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2017年11月，美日首脑会谈后，日本承诺从美国采购舰载改良型导弹“标准”-3Block 2A。据日本防务省测算，这笔采购价格要比最初估价高16%，颇有漫天要价和强买强卖的性质，在日本社会引发了“把美军需产业利益置于日安保必要性之上”的舆论风波。^②

2018年11月，日本政府向特朗普政府透露其未来五年的国防开支预算，其中特别强调购买美国军事装备，这与此前宣布单年度开支计划的做法不同。^③ 日本通常以财政年度为基础公布国防支出，但中期数据将有助于展示其购买更多美国防装备的计划，以展示其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的诚意。2019年3月，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其坚定地履行在边野古(Henoko)为美海军陆战队建造新基地以替代普天间机场的承

^① 李庆四、王大千：《特朗普政府美日同盟关系探析》，载《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1期，第47~59页。

^② 杨伯江、慕健：《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演变、矛盾及影响》，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3期，第11~17页。

^③ Shunkuke Shigeta, “Abe to Convey 5-year Defense Spending Plans to Trump”, Nikkei Asia, November 29, 2018,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Abe-to-convey-5-year-defense-spending-plans-to-Trump>.

诺，并反驳了边野古基地建设工程给县民增加负担的指责。^①

(2) 日本利益攸关认知降低。尽管安倍政府做出种种妥协，但特朗普似乎并不买账，依然没有改变对日本在成本分担问题上的极限施压，要求日本为驻日美军支付更多费用，否认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角色价值。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文指出，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和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在2019年7月访问亚洲期间，要求日方每年增加四倍于往年的费用至80亿美元，以支付在日驻扎的50000名美军的费用开支。^② 同年，特朗普进一步提出了“成本+50”（Cost Plus 50）的概念，要求所有驻扎美军的国家同意在补贴美国军事存在的全部费用之外，额外支付该金额的50%。^③ 兰德公司研究指出，美国这种基于交易的协议并不可靠，会对那些在和平时期和特定突发事件中为美国提供最可靠支持的持久合作伙伴产生负面影响，并有在实质上将这些持久合作伙伴转变为交易合作伙伴的风险。^④

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削弱了对美日同盟的战略承诺。特朗普对朝鲜反复无常的态度及其与朝鲜的多次交往，令日本颇感不安。2017年，特朗普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誓言要打垮朝鲜等“失败的恐怖分子”，并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称作“疯子”和“执行自杀任务的火箭人”。^⑤ 然而仅一年后，特朗普因金正恩同意释放三名在朝鲜监狱关押的美国人而称其“很好”且“十分可敬”。对这种画风突变的表态，不少批评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对朝问题上缺乏坚定的立场。^⑥ 2019

① 王欢、史倩：《安倍：不完成基地搬迁计划就无法要回普天间，将坚定履行责任》，环球网，2019年3月25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mKiIEM>。

② Lara Seligman and Robbie Gramer, “Trump Asks Tokyo to Quadruple Payments for U. S. Troops in Japan”,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15,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1/15/trump-asks-tokyo-quadruple-payments-us-troops-japan/>。

③ Nick Wadhams and Jennifer Jacobs, “President Trump Reportedly Wants Allies to Pay Full Cost of Hosting U. S. Troops Abroad ‘Plus 50%’”, *Time Magazine*, March 8, 2019, <https://time.com/5548013/trump-allies-pay-cost-plus-50-troops/>。

④ Stacie L. Pettyjohn, “‘Cost Plus 50’ Explained”, *Rand*, March 15, 2019, <https://www.rand.org/blog/2019/03/cost-plus-50-explained.html>。

⑤ “Trump Takes Aim at N Korea’s ‘Rocket Man’ on Twitter”, *Aljazeera*, September 17, 2017,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7/9/17/trump-takes-aim-at-n-koreas-rocket-man-on-twitter>。

⑥ Julie Hirschfeld Davis, “Trump on Kim Jong-un: Once a ‘Madman’, Now a ‘Very Honorable’ Leader”, *New York Times*, May 10,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5/10/us/politics/trump-kim-jong-un-language.html?_ga=2.61497580.1381288229.1693369999-315513684.1677722325。

年6月，在没有征询甚至通知日本政府的情况下，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面，成为首位踏入朝鲜领土的美国在任总统。在会面中，特朗普没有提出日本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导弹以及绑架日本公民的担忧，给日方留下了特朗普不关心日本安全甚至将日本在朝核问题中边缘化的印象，令日本对美日同盟的存在价值产生了质疑。2019年G20峰会前夕，特朗普更是大放厥词批评美日同盟：“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利用了美国的巨大优势……但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日本根本不需要帮助我们。他们可以在索尼电视上观看这次袭击。”^①这种表态进一步否定了日本的角色价值，严重削弱了日本的利益攸关认知。

(3) 美日同盟凝聚力的削弱。在利益攸关认知降低的影响下，日本出于自身安全与经济利益的考量，在维护美日同盟的同时，也开始实施诸多寻求自主性的政策，一定程度体现了美日同盟凝聚力的削弱。2020年6月，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Taro Kono）证实，日本政府已决定取消部署路基宙斯盾（Aegis Ashore）防御系统的计划。日本原计划在山口县和秋田县部署该防御系统，以应对所谓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导弹威胁。日方此次令人意外地取消部署，是对已经习惯了密切协调的美日同盟的一次震动，有分析认为这是日方在为未来与美国就联盟成本分担问题预留的“讨价还价”筹码，^②也有观点指出这是日本避免过度刺激中国的一种努力。无论哪种情况，都展现出日方寻求自主性的尝试。

同年，日本防卫省宣布将自行生产下一代喷气式战斗机，拒绝了美国公司的计划，并称这将使日本工业受益。一位与安倍关系密切、受人尊敬的日本学者细谷雄一（Yuichi Hosoya）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是时候重新评估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并建立自己的防御能力，并质疑美国是否会继续致力于日本的防务。^③细谷的言论表达了许多日本观察人士私下里越来越多地有关日本对美国的担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日同盟凝聚力下降的原因。

^① Linda Sieg and Daniel Leussink, “Trump Renews Criticism of Japan-US Alliance before G20 Summit”, Reuters, June 27,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g20-summit-trump-japan-idUSKCN1TS057>.

^② Benjamin Schreer, “What Japan’s U-turn on Aegis Ashore Says about US Alliance Management”, The Strategist, June 18, 2020,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what-japans-u-turn-on-aegis-ashore-says-about-us-alliance-management/>.

^③ Michael J. Green and Jeffrey W. Hornung, “Are U. S. -Japan Relations on the Rocks?”, Rand, July 20, 2020, <https://www.rand.org/blog/2020/07/are-us-japan-relations-on-the-rocks.html>.

2. 拜登政府时期的美日同盟

(1) 日本增加联盟成本分担。2022年3月，日本议会确定了日本用于支付驻日美军费用的数额，该问题曾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引起美日双方的较大争议。这笔价值86亿美元的五年期预算于2022年4月正式生效，持续到2027年。^①同年12月，日本正式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力量整備计划》《国家防卫战略》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美制宙斯盾驱逐舰数量从8艘增加到10艘，使日方拥有的该类型驱逐舰在规模和性能上稳居亚洲第一。日方宣称，此举是“考虑到未来与中国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有必要增加宙斯盾驱逐舰的数量，以保护舰队免受中国反舰的袭击”。^②

2022年年底，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政府大幅增加2023年国防预算，较2022年增加26.3%，达6.82万亿日元（520亿美元）。在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领导下，日本国防预算稳步增加至5.3万亿日元（约合390亿美元），占政府整体预算的5.2%，而岸田此次调整将国防预算的比例进一步大幅提升至5.9%。^③由于更新后的国防建设计划需要数年时间进行采购，日本在第一年签订尽可能多的合同，以便迅速向自卫队部队交付装备。截至2023年5月，即财政年度开始一个月后，日本政府宣布与三菱重工签订价值3800亿日元（28亿美元）的合同，以升级和批量生产12型地对舰导弹。此外，日本政府还与美国签署了价值1104亿日元（8.16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400枚战斧巡航导弹。^④岸田对众议院议员表示，购买“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政府努力获取针对潜在威胁的远程威慑力量的一部分”。^⑤

① Lucy Craft, “Japan Approves 5 Years More Funding for U. S. Military Presence as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 Threats Loom Large”, CBS News, March 25, 2022, <https://www.cbsnews.com/news/japan-us-military-host-nation-budget-china-north-korea-russia-threats/>.

② 陈山：《高度警惕！日本打造亚洲最大宙斯盾战舰群》，《环球时报》，2023年1月5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4B9jgwQU0tW>。

③ Ryosuke Hanada, “Fighting to Fund Japan’s Historic Defence Budget Increase”, East Asia Forum, May 17, 2023,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5/17/fighting-to-fund-japans-historic-defence-budget-increase/>.

④ Jesse Johnson, “U. S. Approves Deal to Sell Long-range Tomahawk Missiles to Japan”, The Japan Times, November 18, 2023,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3/11/18/japan/politics/us-japan-state-department-tomahawk-missile-sale-approval/>.

⑤ Ryo Nemoto, “Japan Seeks to Buy 400 U. S. Tomahawk Missiles, Kishida Says”, Nikkei Asia, February 28, 2023,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Defense/Japan-seeks-to-buy-400-U.-S.-Tomahawk-missiles-Kishida-says>.

(2) 日本利益攸关认知提升。鉴于日本加大对美日同盟的成本分担以及增加对自身安全力量的投入，拜登政府对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认可。2021年4月，拜登在华盛顿会见了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这是其就任美国总统后会见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并续签了美日同盟。双方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美日同盟已成为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石。我们虽远隔重洋，但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国际法、多边主义以及自由公平经济秩序等“普世价值”和共同原则的承诺将我们团结在一起”。^① 2023年1月13日，岸田文雄与拜登举行首脑会谈，这是他2021年上任以来首次访问美国。双方在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拜登一方面在声明中高度评价日本“从根本上增强防卫能力和加强外交努力的领导能力”，对日方在美日同盟中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认可；另一方面他强调，“我们的安全同盟从未如此强大……美国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坚定不移地承诺利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全部能力来保卫日本”，是美国向日方展示其战略承诺的重要表现。^②

2023年8月18日，拜登邀请日韩领导人在美总统乡村官邸戴维营举行三方峰会，将日本的利益攸关认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戴维营在美国外交中具有传奇地位。拜登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想不出比这更适合开启下一个合作时代的地方了——这个地方长期以来一直象征着新起点和新可能性的力量。”^③ 兰德公司专门研究日本和“印太”外交的高级政治学家杰弗里·霍农（Jeffrey Hornung）指出，受邀访问戴维营比访问白宫要难得多。霍农说：“戴维营的象征意义很重要，因为日本和韩国领导人

① “U. S.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 S. -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The White House, April 16,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

②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13,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1/13/joint-statement-of-the-united-states-and-japan/>.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President Yoon Suk Yeol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da Fumio of Japa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 August 1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8/18/remarks-by-president-biden-president-yoon-suk-yeol-of-the-republic-of-korea-and-prime-minister-kishida-fumio-of-japan-in-joint-press-conference-camp-david-md/>.

知道这是一件特别的事情，你需要受到邀请，总统只会在某些场合这样做。”^① 对于此次戴维营峰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许多历史性会议在戴维营举行，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通过这次会议在其历史上写下新的一页。”^② 这种表态充分反映了日本在拜登的肯定与鼓励下，其利益攸关认知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

(3) 美日同盟凝聚力的强化。在拜登政府的充分认可与鼓励下，日本的利益攸关认知得到了极大地增强，这也促使美日同盟凝聚力实现了稳步提升。与特朗普时期美日同盟愈发明显的交易性特征不同，拜登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意识形态色彩日益凸显，^③ 美日同盟的精神内核得以恢复甚至进一步强化，避免了美日同盟从持久伙伴关系滑向交易关系的风险。从拜登上台后美日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声明可见，“自由、民主、法治”等字眼被反复提及。基于这种共同的意识形态，美日双方展现出较强的联盟政策与战略行为协调，特别是利用所谓“普世价值观”强化“民主—专政”的二元对立叙事，借新冠肺炎疫情、台海问题、乌克兰危机等对中国实施“污名化”战略，这既是加强美日同盟凝聚力的方式，也是其凝聚力提升的重要表现。

美日同盟凝聚力的强化还表现为两国在台海战略协调性的提升。2021年4月，日美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④ 这是自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首次突破美日首脑联合声明不涉台的惯例。2023年岸田访美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又一次强调了“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

① Asma Khalid and Franco Ordonez, “How Biden Used Camp David to Elevate a Summit wi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National Public Radio, August 18, 2023, <https://www.npr.org/2023/08/18/1194220556/camp-david-biden-japan-korea>.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President Yoon Suk Yeol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da Fumio of Japa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 August 1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8/18/remarks-by-president-biden-president-yoon-suk-yeol-of-the-republic-of-korea-and-prime-minister-kishida-fumio-of-japan-in-joint-press-conference-camp-david-md/>.

③ 徐万胜、罗楨昀：《从意识形态议题论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载《日本学刊》2023年第2期，第56～76页。

④ “U. S.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 S. -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The White House, April 16,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

稳定的重要性，这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①与此同时，美日同盟还强化了应对“台海有事”的实战化准备。2021年12月，美日制定了《日美新联合作战计划草案》，根据该计划，美海军陆战队将在台湾地区出现“紧急状态”初期在从日本九州延伸到台湾地区的岛链上建立临时军事基地，而日方将在弹药和燃料上提供后援支持。^②自2022年以来，日本在联合军事演习、提升作战能力、部队整编升格等方面积极与美军协同对接，旨在强化美日同盟在应对“台湾有事”的作战分工与行动协调。^③

3. 小结

通过对美日同盟在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时期的凝聚力变化进行分析，可以较好地论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总体而言，当联盟主导国美国不增加或减少联盟成本分担，而从属国日本增加投入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未能给予美日同盟充分的战略承诺以及日本在联盟中的角色价值认可，这不利于提升甚至降低了日本的利益攸关认知，进而削弱了美日同盟的凝聚力；然而在相同的成本分担前提下，拜登政府给予了美日同盟充分的战略承诺以及日本在联盟中的角色价值认可，极大地提升了日本的利益攸关认知，进而强化美日同盟的凝聚力。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始终在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历届政府对美日同盟的重要意义，以及日本在联盟中的角色价值，均给予了高度的认可。这种重视程度给日本带来的高利益攸关认知，与特朗普政府的否定和打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更好地说明了拜登政府对日本的肯定与鼓励，对重塑美日同盟凝聚力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相较之下，战后美国政府对美韩同盟的重视程度，始终没有达到美日同盟的高度。正因此，拜登政府近期对韩国角色价值认可程度的提升，为利益攸关认知对联盟凝聚力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经验证据。

^①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13,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1/13/joint-statement-of-the-united-states-and-japan/>.

^② “Japan, U. S. Draft Operation Plan for Taiwan Contingency; Sources”, Kyodo News, December 23, 2021,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1/12/f5ed60ab6502-japan-us-draft-operation-plan-for-taiwan-contingency-sources.html>.

^③ 张杨：《拜登上台以来的美日同盟台海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3期，第24～45页。

（二）美韩同盟

1.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韩同盟

（1）韩国增加联盟成本分担。2019年2月，美韩达成为期一年的费用分摊协议，韩国同意支付9.2亿美元，帮助支付28500名驻韩美军的费用，比2018年的预算多出7000万美元。同年，韩国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这一比例较美国的任何一个欧洲盟友都要高。^① 汉弗莱斯营（Camp Humphreys）是美国在外国领土上最大的基地，建设成本共耗资约110亿美元，韩国担负了其中92%的建设费用。^② 从2015年至2019年，韩国从美国购买了130亿美元的武器。尽管如此，2019年特朗普仍然要求韩国应将支付驻韩美军的费用增加5倍，达到每年50亿美元。^③

（2）韩国利益攸关认知降低。尽管韩国在特朗普四年任期中，持续增加对美韩同盟的投入，但特朗普对美韩同盟的蔑视导致双方信任出现巨大裂痕。特朗普曾明确表示，他不理解美国亚太同盟的价值，甚至提出韩国和日本等盟友应该通过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保护自己。更为严重的是，特朗普多次以撤军相威胁，对韩国进行“敲竹杠”。2018年3月，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不能与韩国在自由贸易协定（KORUS FTA）的基础上达成更好的协议，他将考虑从韩国撤军。韩国财政部部长金东妍（Kim Dong-yeon）对此进行了回击：“我们认为将经济问题与美国撤军这样的问题联系起来并不理想。”^④ 2020年，由于美韩两国对特朗普要求韩国大幅增加驻韩美军的成本分摊存在

^① Bruce Klingner, Jung H. Pak and Sue Mi Terry, “Trump Shakedowns are Threatening Two Key US Alliances in Asia”, The Brookings, December 18,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rump-shakedowns-are-threatening-two-key-us-alliances-in-asia/>.

^② Joseph Hincks, “Inside Camp Humphreys, South Korea: America’s Large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Time Magazine, July 11, 2018, <https://time.com/5324575/us-camp-humphreys-south-korea-largest-military-base/>.

^③ Hyeonhee Shin, “A \$5 Billion Bill and Japan Tensions in Focus as U. S. Defence Heads Visit South Korea”, Reuters, November 13,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outhkorea-usa-idUSKBN1XN09C/>.

^④ Veronica Stracqualursi, “Trump Apparently Threatens to Withdraw from South Korea over Trade”, CNN, March 16, 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03/15/politics/trump-us-troops-south-korea/index.html>.

分歧，五角大楼向白宫提出减少美国在韩驻军的选项。^①

美韩在《特别措施协议》(SMA)的谈判问题上也凸显了美方极限施压政策的特征。该协议在2018年临近到期时，特朗普政府要求韩方增加150%（每年12亿美元）的支出，以维持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②韩国则通过提供8.2%的增幅和较短的到期日来抵消美方严苛的要求，并且确保以每年递增的方式重新谈判。^③当该协议于2019年年底再次到期时，特朗普政府要求韩国大幅增加500%的支出，导致该谈判拖延数月。^④然而，在特朗普在驻军费用分摊上对韩国咄咄逼人之际，他却刻意忽略了韩国为美国最大海外军事基地汉弗莱斯营承担了92%建设成本的事实，该军事基地的总造价高达110亿美元，并且主要客户是美国国防公司。^⑤

特朗普将韩国视为次要合作伙伴，并在广泛的经济、安全和军事问题上欺凌这个东亚盟友。为了在2017年寻求竞选胜利，他声称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是造成美国就业岗位流失的重要原因，并以威胁退出协定作为手段，迫使韩方重新谈判。^⑥特朗普深信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有损美国利益，因此继续对韩国主要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以示惩罚。^⑦特朗普政府对待韩国的不友好行

① Michael R. Gordon and Gordon Lubold, "Trump Administration Weighs Troop Cut in South Kore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7,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trump-administration-weighs-troop-cut-in-south-korea-11595005050>.

② Gordon Lubold and Andrew Jeong, "Trump Wants South Korea to Pay More for U.S. Troop Presenc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7, 2018, <https://www.wsj.com/articles/trump-wants-south-korea-to-pay-more-for-u-s-troop-presence-1544221727>.

③ Park Ji-won, "Cost for U.S. Troops to Rise 8.2%", *The Korea Times*, February 10, 2019, https://www.koreatimes.co.kr/www/nation/2019/02/205_263407.html.

④ Anthony Kuhn, "U.S. and South Korea Negotiate Cost-Sharing Deal of U.S. Military Presence", *National Public Radio*, March 5, 2020, <https://www.npr.org/2020/03/05/812644970/u-s-and-south-korea-negotiate-cost-sharing-deal-of-u-s-military-presence>.

⑤ Michael Fuchs and Haneul Lee, "Bridging the Divide in the U.S.-South Korea Allianc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November 23, 2020,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bridging-divide-u-s-south-korea-alliance/>.

⑥ Michelle Ye Hee Lee, "Trump Wants to End 'Horrible' South Korea-U.S. Trade Deal. Koreans Disagree",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4,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trump-wants-to-end-horrible-south-korea-us-trade-deal-koreans-disagree/2017/09/13/fb528b3e-9627-11e7-a527-3573bd073e02_story.html.

⑦ Ana Swanson, "Trump's Trade Plan Threatens to Derail Korean Security Talk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6,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06/us/politics/trumps-trade-south-korea.html>.

为损害了其在韩国人心中的地位。根据皮尤 2020 年 9 月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虽然 92% 的韩国公众仍然支持美韩同盟，但公众对美国的正面认知已降至几乎历史最低的 45%。^① 同时，只有 4% 的韩国人支持韩国在费用分摊谈判中多支付数十亿美元，且韩国人对特朗普总统的信心仅为 17%。^② 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评论称，特朗普对韩国过多的成本分摊要求正在使基于共同原则和目标的联盟退化为纯粹的交易关系，并引发韩对联盟主导国美国战略承诺的担忧。^③

(3) 美韩同盟凝聚力的削弱。韩国利益攸关认知的降低，促使其在外交、安全和经济等多领域寻求自主性，一是缓解特朗普对美韩同盟战略承诺不足带来的负面效应，二是致力于提升韩国在同盟中的作用和影响，以抵消特朗普的刻意打压。

特朗普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评价的嬗变性，令利益攸关认知本就降低的韩国更加心神不宁，这促使韩方在韩朝关系上主动创造外交空间、谋求战略主动。根据文在寅的前幕僚长任钟哲 (Im Jong-seok) 的披露，时任美国国务院朝鲜事务特别代表史蒂芬·比根 (Stephen Biegun) 主张，应将统一步排除在负责协调朝鲜半岛事务的韩美工作组之外。任钟哲说：“与向我们施压相比，要求我们停止所有朝韩之间的沟通，直到比根同意为止，更让人难以接受。当华盛顿的官员说‘不’时，首尔就无能为力。”^④ 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韩朝关系的改善应与无核化同步进行，然而，任钟哲暗示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韩国寻求积极营造有利于朝韩关系的氛围，这显然与美国在该问题上的原则相冲突。^⑤ 与此同时，韩国积极与中国就朝核问题保持频繁沟通

① Richard Wike, Janell Fetterolf and Mara Mordecai, “U. S. Image Plummetts Internationally as Most Say Country has Handled Coronavirus Badly”,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15, 2020.

② Elliot Waldman, “Can the U. S.-South Korea Alliance Weather another Trump ‘Shakedown’?”, World Politics Review, February 25, 2020,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can-us-south-korea-relations-withstand-another-trump-shakedown/>.

③ Bruce Klingner, Jung H. Pak and Sue Mi Terry, “Trump Shakedowns are Threatening Two Key US Alliances in Asia”, The Brookings, December 18,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rump-shakedowns-are-threatening-two-key-us-alliances-in-asia/>.

④ Sean Lee, “Moon Jae-in Holds on to His Dream of North Korea Diplomacy”, The Diplomat, June 2,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6/moon-jae-in-holds-on-to-his-dream-of-north-korea-diplomacy/>.

⑤ Ibid.

与接触，希望得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①

时任总统文在寅在经济领域寻求自主性的努力，体现在通过提出“新北方政策”，以积极谋求与其他地区主要国家合作。2017年9月，文在寅在出席“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上首次提出“新北方政策”，旨在为朝鲜半岛带来可持续和平、改善韩国的长期经济前景，以及塑造有利于韩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新北方政策”致力于将朝鲜半岛融入欧亚的互联互通之中。一方面，尽管特朗普一再打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文在寅政府仍然积极寻求与该倡议的对接。2019年6月，文在寅在日本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向习近平表示，韩国愿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韩中共建“一带一路”对韩国利益攸关。^②另一方面，文在寅政府积极将“新北方政策”与俄罗斯的“新东方政策”进行对接，并据此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九桥战略”，希望在天然气、铁路和港湾等领域与俄方加强合作。^③

2. 拜登政府时期的美韩同盟

(1) 韩国增加联盟成本分担。2021年4月，经过长期谈判，韩美正式签署了新的《特别措施协定》。根据该协定，韩国2021年将支付维持28500名驻韩美军的1.1833万亿韩元（10.59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13.9%。^④2022年12月，韩国国防部公布了2023~2027年五年国防规划，根据该规划，韩国政府将总共花费331.4万亿韩元（约合1.8131万亿元人民币）用于建设和运营军事力量，其中以“韩国型三轴体系”为主的装备费用将越来越高。^⑤具体而言，韩国将向美国增购20架F-35A隐形战斗机，部署战术地对地导弹和新的宙斯盾驱逐舰。2023年4月，韩国国防部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审议通过了《2023~2037年国防科学技术革新基本计划》，选

^① 韦宗友：《“美国优先”对美韩、美日同盟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6期，第84~98页。

^② Ramon Pacheco Pardo, “Moon’s Eurasia: Opening up North Korea, Serving Seoul’s Interests”, *The Interpreter*, December 18, 2018,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moon-s-eurasia-opening-north-korea-serving-seoul-s-interests>.

^③ 郭培清、宋晗：《“新北方政策”下的韩俄远东 北极合作及对中国启示》，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8期，第1~12页。

^④ 《美韩正式签署新的军费分摊协议：艰苦谈判18个月，还是涨了》，环球网，2021年4月9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42eBnQ69dub>。

^⑤ 《韩国发布国防五年规划 军费近1.8万亿元》，韩联社（中文版），2022年12月28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221228002300881>。

定了十大领域的 30 项国防战略技术，重点投资发展定向能武器、高超音速导弹和导弹防御系统等。^①

(2) 韩国利益攸关认知提升。2022 年 5 月，拜登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尹锡悦进行会面。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拜登确认美国利用其全方位防御能力，包括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导弹防御能力等，对韩国给予了延伸威慑的战略承诺。^② 在此次联合声明中，拜登与尹锡悦一致认为，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基础，这是美国对韩国在双边经济关系中所做贡献的认可，与特朗普批评该协议是不公平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23 年 4 月，拜登在华盛顿会见了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尹锡悦，纪念美韩同盟成立 70 周年。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了美国对韩国的安全承诺是持久与坚定的，朝鲜对韩国的任何核攻击都将得到美国迅速、压倒性和果断地回应。拜登政府的表态，与特朗普让韩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形成了鲜明对比，是对美韩同盟坚定的战略承诺。声明还表示，美韩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关键，反映出两国作为全球领导者在推进民主、经济繁荣、安全和技术创新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韩国提出的“全球枢纽国家”外交战略，拜登在声明中给予了充分支持，高度赞赏韩国主动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包括主办民主峰会、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北约和七国集团（G7）的伙伴关系，以及继续扩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③

除在言语上给予大力支持外，美国于 2023 年 7 月在韩国釜山港停靠了一艘核武装弹道导弹潜艇（SSBN），这还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第一次。韩国防部部长李钟燮（Lee Jong-sup）称此举表明了美国履行延伸威慑

① 《韩公布未来 5 年国防科技发展计划，重点发展激光、高超等武器》，澎湃新闻，2023 年 4 月 20 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776116?from=。

② “United States-Republic of Korea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May 2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1/united-states-republic-of-korea-leaders-joint-statement/>.

③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White House, April 26,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4/26/leaders-joint-statement-in-commemoration-of-the-70th-anniversary-of-the-alliance-betwee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and-the-republic-of-korea/>.

承诺的决心，显示了联盟针对朝鲜的压倒性能力与姿态。^① 2023年8月的美日韩戴维营峰会是提升韩国利益攸关认知的一剂强心针。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尹锡悦发表讲话，再三感谢拜登的邀请与热情接待，并大力突出此次峰会的重要意义以及韩国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景。^② 尹锡悦将韩国与美日称之为“印太”地区最先进的“自由民主”国家，并强调三方合作将为加强地区安全与繁荣发挥关键作用，这凸显了韩国对美韩同盟乃至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持有较高的利益攸关认知。

(3) 美韩同盟凝聚力的强化。在韩国利益攸关认知不断提升的推动下，美韩同盟的凝聚力也得到了相应的强化。2023年4月，尹锡悦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12年来首位对美访问的韩国总统。美韩签署《华盛顿宣言》，强调美韩同盟致力于就核威慑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包括就韩国和“印太”地区日益严重的核威胁加强对话和信息共享。两国总统宣布成立新的核磋商小组，以加强延伸威慑，讨论核与战略规划，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③

韩国主动与日本谋求并实现和解，展示了韩国对美“印太战略”的大力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韩同盟凝聚力的强化。2023年3月6日，尹锡悦政府宣布，韩方设立一个公共赔偿基金，从韩国私人领域筹措资金，向1910年至1945年间被日本殖民者强征为劳工的韩国受害者支付赔偿，此举被韩在野党痛批为“背叛历史”。^④ 在此基础上，2023年3月，尹锡悦开启了韩国总统12年来首次对日本的正式访问，恢复韩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定期会晤，取消了自2019年以来针锋相对的贸易措施，并接受了共同的安全议程。拜登政府对韩日外交和解给予了较高评价，白宫和国务院分别发表声

① “US Deploys Nuclear-Armed Submarine to South Korea”, Aljazeera, July 18, 2023,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7/18/us-deploys-nuclear-armed-submarine-to-south-korea>.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President Yoon Suk Yeol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da Fumio of Japa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 August 1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8/18/remarks-by-president-biden-president-yoon-suk-yeol-of-the-republic-of-korea-and-prime-minister-kishida-fumio-of-japan-in-joint-press-conference-camp-david-md/>.

③ “Washington Declaration”, The White House, April 26,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4/26/washington-declaration-2/>.

④ 《代日本赔偿韩国劳工受害者 尹锡悦政府遭痛批“背叛历史”》，新华网，2023年3月6日，http://www.news.cn/world/2023-03/06/c_1211735781.htm。

明，欢迎两国之间的“历史性声明”和“开创性的新篇章”。^①从结果看，韩日和解为美日韩戴维营峰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韩国积极与美国保持战略协调的有力表现。

3. 小结

美韩同盟在近两任美国政府时期凝聚力的变化，较好地反映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总体而言，当主导国美国不增加或减少联盟成本分担，而从属国韩国增加投入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未能给予美韩同盟充分的战略承诺以及韩国在联盟中的角色价值认可，这不利于提升甚至降低了韩国的利益攸关认知，进而削弱了美韩同盟的凝聚力；然而，同样是在韩国增加成本分担的前提下，拜登政府却给予美韩同盟充分的战略承诺以及韩国在联盟中的角色价值认可，极大地提升了韩国的利益攸关认知，进而强化美韩同盟的凝聚力。由此观之，美韩同盟与美日同盟存在一定的共同之处，两者均给利益攸关认知与联盟凝聚力之间的因果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纵观战后美国同盟的发展史，美韩同盟在美国东亚同盟体系中，始终没有获得过与美日同盟同等重要的地位。换言之，美国对美韩同盟的战略承诺，以及对韩国在美韩同盟中的角色价值认可，也没有达到过对美日同盟的认可程度。因此，韩国对美韩同盟的利益攸关认知，也从未企及日本对美日同盟利益攸关认知的高度。然而，正是这种基于历史的差别，才更有利于说明利益攸关认知的变化对联盟凝聚力的作用。拜登政府一方面对韩国“全球枢纽国家”战略给予大力支持，另一方面通过美日韩戴维营峰会给予了韩国与日本同等重要的角色认可。由此可见，美国对美韩同盟存在价值与韩国角色价值的认可增量，应当超过了对日本的认可增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尹锡悦政府能够不惜以“背叛历史”为代价极力推动日韩和解，以助力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

五、结 论

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到拜登政府时期，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

^① “South Korea-Japan Rapprochement Creates New Opportunities in the Indo-Pacific”, The Brookings, March 17, 2023,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korea-japan-rapprochement-creates-new-opportunities-in-the-indo-pacific/>.

盟友，日本与韩国在联盟成本分担方面都表现得较为积极，持续增加对美日和美韩同盟的投入。尽管如此，这两对同盟的凝聚力却在美国前后两任政府期间表现出截然迥异的演化态势。与特朗普时期联盟凝聚力遭受较大削弱不同，拜登政府时期美日、美韩同盟的凝聚力均得到了强化。这种反差现象不仅在理论上对传统联盟理论关于“主导国分担联盟成本与联盟凝聚力呈较强正相关性”的假定提出了挑战，而且也产生了“从属国分担越多成本，却对联盟凝聚力产生截然不同影响”的经验困惑。

针对这种挑战与困惑，本文将利益攸关认知概念引入联盟理论，致力于在联盟成本分担与联盟凝聚力之间补充一个缺失的关键逻辑环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有助于提升联盟凝聚力解释力的理论框架。通过运用过程追踪法和案例分析法，对本文提出的理论机制所蕴含的每个分析要素（联盟成本分担、利益攸关认知、联盟凝聚力）逐一进行了实证考察，论证了文章提出的两点基本假设。具体而言，对特朗普时期美日、美韩同盟凝聚力的考察论证了假设一，即在联盟主导国不增加或减少联盟成本分担，而从属国增加投入的前提下，如果主导国削弱联盟战略承诺且否定从属国角色价值，将降低从属国的利益攸关认知，进而削弱联盟凝聚力。对拜登政府时期美日、美韩同盟凝聚力的考察论证了假设二，即在联盟主导国不增加或减少联盟成本分担，而从属国增加投入的前提下，如果主导国加强联盟战略承诺且肯定从属国角色价值，将提升从属国的利益攸关认知，进而强化联盟凝聚力。

通过引入利益攸关认知，本文一定程度弥补了既有联盟政治文献中关于联盟成本分担与联盟凝聚力关系研究的不足，在理论上丰富了解释联盟凝聚力的研究路径，在实证上有助于探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演化的内在动力，为中国应对美日韩联盟的进一步发展、制定有利于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